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之九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李 霖 燦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臺灣 南 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之九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李 霖 燦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臺灣 南 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九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著作者	李 霖 燦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代售處 AGENTS	大陸雜誌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CHINESE MATERIALS &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54 Chi-nan Road, Section 3
Taipei (P. O. Box 22048)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E
(Chi C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海風書店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
一丁目五番地

ORIENTALIA BOOKSHOP, INC.

11 East 12th Street, New York 3,
N. Y., U.S.A.

定價新臺幣捌拾元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目 錄

一、前 言	1
二、紐約都會博物館中的維摩詰經	3
三、聖地安哥藝術館中的雲南觀音像	11
四、故宮博物院的大理國梵像卷	14
五、日本京都有隣館中的南詔圖傳	40
六、結 語	51
參考書目	62
英文摘要	65
圖版 I—XLV	

圖 版 目 錄

- Plate I.....紐約都會博物館中的維摩詰經卷
- Plate II-IV.....美國聖第安哥藝術館的雲南觀音銅像
- Plate V-XXXIX.....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
- Plate XXXIX-XXXXII.....南詔圖傳
- Plate XLIII-XLV.....南詔圖傳文字卷

**A STUDY OF THE NAN-CHAO AND TA-LI KINGDOMS
IN THE LIGHT OF ART MATERIALS FOUND
IN VARIOUS MUSEUMS**

CONTENTS

I. Preface.....	1
II. The Vimalakirti Sutra Scroll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3
III. The Bronze Image of Avalokitesvara in the Fine Arts Gallery of San Diego.....	11
IV. Chang Sheng-wen's Handscroll of Buddhist Image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hina.....	14
V. An Illustrated Handscroll of the Nan-Chao Kingdom in the Fujii Yurinkan, Kyoto, Japan.....	40
VI. Conclusion.....	51
Bibliography.....	62
English Summary.....	65
Plates I—XLV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67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李 霖 燦

- 一、前言
- 二、紐約都會博物館中的維摩詰經
- 三、聖第安哥藝術館中的雲南觀音像
- 四、故宮博物院的大理國梵像卷
- 五、日本京都有隣館中的南詔圖傳
- 六、結語

一、前 言

約當唐宋之際（649—1253 A. D.），在我國的西南邊疆之上，以雲南省的大理一帶為中心，連續有了和中國分庭抗禮的大帝國出現，在唐時是南詔，在宋時是大理國⁽¹⁾。他們和中國壤地相接，又都十分強大，所以都會給予中國的唐宋二朝不少的困擾，若依唐書南詔傳所說，唐代大帝國之亡，實和南詔有極密切的關係；宋太祖有鑒於此，且有揮玉斧割大渡河以外於不顧的讓避決策，都可以說明彼此關係的不容輕視。因之，近來的史學家，對南詔及大理國的研究十分注意，如南詔的建立者是那個民族？他們為什麼竟能兩敗唐師，其宗教的演變實況如何？大理國和南北宋的邦交如何，其世系年代如何安排，其藝術造詣又高到什麼樣的水準……一一都是急待解決而又極有趣味的問題。只是一向因受了資料的限制，一直是在唐書宋史或南詔野史一類的故紙堆中鑽研，却缺少當日的第一手資料來相印證，因而其成就並不十分令人滿意。所以近來的趨勢，是注意到了考古學上的田野發掘和民族學上的實地調查各項資料，意思是想找尋出當時的人證物證，請他們來現身說法，來和現存的紙面史料印證，以求解決那一些久疑不決舐觸紛紜的各項問題，這項辦法顯然是高明正確得多了。

當時的資料，可以被埋藏於地下，也可以留傳於民間，因之用考古及人類學的方

(1) 所謂的後理國，他們自稱仍是大理，例證見下圖版肆。

法，自然可望有良好的收穫，但是我們每每忽略了另一個所在，那就是博物館中的藝術珍藏。民國五十年至五十一年，我因扈從中國古藝術品在美展覽之便，留意到這項問題，於是便廣為徵輯，結果一加統計，現存在各大博物館中的南詔大理資料，竟有很可觀的四件之多，既係藝術珍品，又是學術資料，因而觸動了我寫這篇研究的動機。

在紐約展覽的時候，我於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中看到一卷維摩詰經，紫地金書，前有文殊問疾的圖畫，後有大理國文治九年的干支紀年，而且關涉到宋朝使節禮聘往來的大事，真是最好的一件資料。多謝周方先生李佩博士（Dr. Aschwin Lippe）的好意，不憚煩地特為開櫃任我展卷快讀，後來又蒙該館慨贈全部照片（圖版壹 A. B.）遂使這第一號的資料歸入掌握，因而這項計劃的探討研究，亦得以順利開始。

第二號資料是在讀書時見到，由嘉鑿女士（Miss Helen B. Chapin）的一篇文章中使我知道有一尊大理國段正興（1147—1172 A. D.）所鑄的觀音銅像上有四行中文的銘記，這又是一件重要的造像和史料。多謝高居翰博士（Dr. James Cahill）的幫忙，他從加州南部聖第安哥的美術館（The Fine Arts Gallery, San Diego, Calif. U. S. A.）中為我要來了精美清晰的三張照片（圖版貳，叁，肆），我就從這些照片上繼續展拓這項研究工作。

第三號資料的份量最重，同時也就是我們赴美展覽的“國寶”之一，在展品目錄的編號是 No.45，品名為“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圖版伍一叁拾捌共136單位）。這手卷原是故宮博物院的珍藏，民國二十四年赴倫敦展覽時都沒有拿去，這次在美國展覽時却受到了觀眾的盛大歡迎。全卷展開有五十三呎之長，經常在畫前列滿了熱心欣賞的觀眾。長卷得到了全部展開的機會，越發顯示出它內容的豐富和在歷史研究上的重要。我因忝居扈役之列，經常得到觀摩這十二世紀早期的大理國真實寫照的好機會，因而對南詔大理的研究興趣格外濃厚了。

後來我又從日本京都的有隣館中得到了第四號資料“南詔圖傳”。分為圖畫與文字二卷，內容是南詔開國時的神話故事，大致包括了所謂的梵僧化齋、鐵柱記和西洱河記，是比較民俗學上的大好資料。又是第九第十世紀間南詔宗教史上的重要線索。多謝京都博物館的島田修二郎教授的商洽安排，也感激有隣館的慨允攝照，於是這一卷

成畫雖晚⁽¹⁾故事却早的南詔開國傳說，也為我們收入新得資料研究範圍之中（圖版叁拾玖——肆拾伍）。

資料收集工作告一段落，經過一年來的初步研究之後，凌純聲所長費心安排了這樣一個出版的機會，十分令人感激。因為圖版如此之多，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處理的程序如下：先列前言一目以說明其原委來由，繼而依照時代順序，一一敘述這四項資料的現狀及包涵。若有單純的小問題，能在各節下闡述明白的，我們就方便地加以就地解決。至於牽涉較廣或須綜合排比方能求得結論的問題，我在最後列有結語一目，在這裏作比較重要的歸納，以期能對南詔大理國的研究，投射一兩道新的光輝，添加一兩方可靠的基石。他日歷史學家廣輯羣書，考古家揮動鋤頭，民族學家展開調查，益之以更多的南詔大理遺物自博物館中剖析發現出來，那南詔大理研究的前途是充滿了光輝的。

二、紐約都會博物館中的維摩詰經

依照時代的順序，我們先來觀察這大理國的維摩詰經卷。

本卷高十一吋，長廿五呎，現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編號 M. M. A. 47,18.2，M.M.A. 是該館名稱的縮寫，47是說明於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收藏的。紫色絹地，金書經文，經文前之有佛會圖像，左端有“南无維摩詰會”字樣。以金銀色線條加彩色繪成，畫文殊菩薩前來問疾故事，十分絢麗精美，充分表現出大理國當時的藝術造詣已達很高的水準。（圖版壹）

現在經文所存已非全部，始於維摩詰經的問疾品第五，終於入不二法門第九。在結尾部份，比經文低約四格的樣子，有一段這樣的題跋。現在照原行格抄錄于下，因為雖有圖片，（圖版壹）但紫地金書，日久剝蝕，在印刷品上是沒法顯現清楚的：

大理國相國公高泰明 致心為

大宋國奉使鍾□□□造此

維摩經壹部贊祝將

命還朝福祿遐遐登山步險無所驚虞

（1）嘉瑟女士從圖像上的判斷，認為這長卷當成於十二至十三世紀。我則願意等到親睹原卷時再定年代。

蒙被

聖澤願中國遐邦從茲億萬斯年

而永無隔絕也

文治九年戊戌季冬旦日記

佛頂寺主僧尹 運富監造

這一段跋記，雖很簡單，却頗重要，值得我們細加推敲。依照史學研究的慣例，我們先來確定這有干支紀年的文治九年的定點。按楊慎輯胡蔚注的南詔野史卷上，在後理國段正淳之後，其第二位皇帝為：

和譽^{又名正嚴}封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偽諡憲宗宣仁皇帝

宋徽宗戊子大觀二年即位。明年改元日新。又改文治、永嘉、保天、廣運……政和丁酉七年，命李紫琮充進奉使，入貢于宋。詔遣使冊封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

南宋高宗丙辰紹興六年，王遣使貢象馬於宋，廣西經略安撫使奏之，詔護送行在，優禮答之。

高宗丁卯紹興十七年，禪位為僧。在位三十九年。子正興立。

從這位“後理國”第二位國王的紀錄和維摩詰經來相對照，我們在這裏給大理國的年代史上建立了幾個定點：

一、段和譽即位於宋徽宗的大觀二年（1108），依照南詔大理國的慣例，於第二年改元“日新”。

一、段和譽的“日新”，年號應該是只用了一年，那就是宋徽宗的大觀三年己酉，公元一一〇九年。

二、段和譽的文治年號，依維摩詰經逆推，當始於宋徽宗的大觀四年庚寅，公元一一一〇年

三、文治九年戊戌，公元一一一八，高泰明贈鍾震黃漸之維摩詰卷寫成，當宋徽宗的重和元年

若在中國史書上去找印證，宋史卷二十一，徽宗皇帝本紀的紀錄的有：

政和六年……高麗、占城、大食、真臘、大理、夏國入貢。

七年二月癸亥，以大理國主段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

按政和六年當公元一一一六年，其七年二月癸亥是指一一一七年的二月初五，兩相應照，符節亦合。

政和七年的干支是丁酉，在大理國還只是文治八年，而現在這卷維摩詰經則是文治九年（戊戌）的農曆十二月造成的，這裏面還有一年又十個月的時光需要安排。首先我們推測到這與路途遙遠驛傳需時和寫經繪圖不能一蹴而就都有關係。而且二月奉使，很可能又準備策劃了一些時光，這些使節才東裝就道，不然，只由開封到大理走上一遭，不應該佔去這麼多的時光。

看來山川阻隔跋涉艱難當是個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因為跋語中顯明地提到了“登山步險，無所驚虞”的字樣，想必在旅途之中很有些艱苦耽擱。——那麼，旅途要多少天，又取那一條道路前往，我們就便亦在這裏略作探討：按宋史四百八十八卷，外國四、交趾大理條下：

大理國，卽唐南詔也。熙寧九年（1076，丙辰）遣使貢金裝碧玕山、氈罽、刀劍、犀皮甲、鞍轡。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

政和五年（1115，乙未），廣州觀察使奏：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願爲臣妾，欲聽其入貢。詔麟設局於賓州，凡有奏請，皆俟進止。

六年，（1116，丙申）遣進奉使天賜爽、彥賁、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詔麟與廣東轉運副使徐惕偕詣闕。其所經行，令監司一人主之。

道出荆湖南，當由邵州新化縣至鼎州。而麟家潭之湘鄉，轉運判官喬方欲媚麟，乃排比由邵至潭，由潭至鼎一路。御史劾其當農事之際，而觀望勞民，詔罷。方、紫琮等過鼎，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伴，求詣學瞻拜宣聖像。邵守張察許之，遂往。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舉笏叩首。

七年（1117）二月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四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制以其王段和譽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廟庭以爲爲麟功，並其子暉昨皆遷官。少子暉爲閣門宣贊舍人，已而知桂州。

周種劾麟詐冒，麟得罪。自是大理不復通於中國，間一至黎州互市。

在這裏告訴我們，當北宋之際，宋朝和大理國的交通，是取道湖廣而雲南，其不由四川前往，不知是否受宋太祖揮玉斧割大渡河以外而不顧的傳統影響。但由上面路線的開列，我們可以想像到這是一條很盤曲艱險的路。

因之，旅途上所需之時間，亦必不能太少。依御史劾其觀望妨農的話，我們依最遲的秋收之際來作推算，而於次年二月方抵京師開封，這已是半年以上的時光了。因之我們推算政和七年派人赴雲南冊封段和譽為大理國王，其旅途既阻且長，又加上和高泰明相國酬酢費時，造經繪圖，亦非匆促可辦，那到次年年底方了却此段公案，十分地合乎情理。

維摩詰經尾上關於宋國使臣的名字，只剩下一個“鍾”字，下面三⁽¹⁾個字很像是故意為人拭去，因此我當初只知這是一位姓鍾的大使而已，很可能就是鍾氏後人以此卷出售時特意拭去姓名以使不彰。後來在宋史上遍找鍾大使的名字不得，還以為從此就不能作進一步的探訪，所以那時我曾寫信給周方兄，建議他用紫外線照視一次，金去膠存，依理尚有痕跡可尋的，方聞兄就會用這方面對羅漢的研究得到極好的效果。

周方兄的回答還沒有到來，我在讀南詔野史的時候，就在段和譽的條下，看到：

“政和”六年，遣儒臣鍾震黃漸實勅褒高泰明相國忠貞，封平國公。是年遣使入貢於宋……

這才使我們知道，原來是派遣了兩位大使，一名鍾震，一名黃漸。因此維摩詰經尾的三個空格，我們可以把“震黃漸”三字補上，以復原貌。經卷跋記上的“鍾”字殘留，正證實了這件使節來往的大事真實不虛。

至於高泰明相國，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有大功於段氏，雖名相國，實掌國柄。因為他是本經卷的主人，我們也隨檢兩條，算是對這位功德主的簡略介紹：

“大中國 高泰昇

宋哲宗丙子紹聖三年，昇泰在位二年，寢疾。遺命曰：“我之立，因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國仍還段氏，慎勿背哉！”——及卒，其子高泰明遵遺命還位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復興。號後理國。高氏相之，政令皆出其門，國人稱為高國主，段氏擁虛位而已。

（南詔野史 卷上）

(1) 周方兄近日來信，依他目測格位，他主張只有兩字空格，那當是鍾震之字或號，再不然，鍾震單名，中空一格，是亦一說也，附註于此。

“……高泰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為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由這兩條記錄，我們知道了宋朝的這兩位大使也沒有例外，而且和當國的高泰明氏應酬相處得很好。在鄉隨俗，大理那時上下都信仰佛教，高相國就爲了這件使節來往的大事，特地地造了一冊維摩詰經來贈送這兩位大使留作紀念。在當日，這當是一件平常的事實，如今，事隔八百四十多年，我們却在紅塵十丈的紐約市中和這經卷相逢，就覺得頗不尋常，不但高泰明鍾震黃漸等藉此一卷功德以傳，而一代國使交往的史蹟，亦因此經得以實證，真是所謂的佛法史蹟不可思議了。

大理國王向宋徽宗進獻的禮物中，第一項就是貢馬三百八十四匹，大理國產馬，原是有名的，所謂的越巂馬，一再見之於唐宋史籍。由史籍上推尋，這原是有重要的軍事作用在內：宋史大理國條下：

“紹興三年（1133），廣西奏，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不欲以虛名勞民也。朱勝非奏曰：“昔年大理國入貢，言者深指其妄，黃璘由是獲罪。“帝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但讎當其馬價，則馬方至，用益騎兵，不爲無補也。”

六年（1136）七月，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復遣使奉表貢象馬。詔經略司護送行在，優禮答之。九月翰林學士朱震上言：“乞諭廣西帥臣，凡市馬，當擇謹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啓邊釁。異時南北路通，則漸減廣西市馬之數，庶幾患消於未然。”——詔從之。

由此可以看出，宋國和大理交往，戰馬爲主要原因之一。南渡之後，便從西南購買軍馬北抗金兵，廣西是一個主要市馬所在，大理國就是主要對象之一，這在嶺外代答卷五經略司買馬條及卷九蠻馬條上都有很顯明的著錄，可知那些南渡君臣，並不會忘懷於北伐中原。而定都臨安之後，距西南遠較汴梁爲近，所以使臣來往，旅途時間亦爲之縮短了不少。

貢品之一細氈，與熙寧九年（1076）進貢的氈罽，當是一物，亦是南詔大理的特產，嶺外代答卷六，氈條：

“西南蠻，地產綿羊，固宜多氈毳。自蠻王而下至小王，無一不披氈者。但蠻王

中錦衫披氈，小蠻祖楊披氈爾。北氈厚而堅，南氈之長至三丈餘，其濶亦一丈六七尺，摺其濶而夾縫之，猶濶八九尺許，以一長氈帶貫其褶處，乃披氈而繫帶於腰，婆娑然也。晝則披，夜則臥，雨晴寒暑，未嘗體身。其上有核桃紋長大而輕者爲妙。大理國所產也，佳者緣以皂。

這使我們想到如今大小涼山的傣羅族人所披的“查爾哇”，式樣種類大小用途，一一與紀錄無異。大理出這種披氈，在大理國梵像卷上第2單位圖中的“大軍將”就披着這個東西。若再向上逆溯，新唐書上說的異牟尋遣清平官尹輔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刀、生金、瑟瑟、牛黃、虎珀、氈、紡絲、象、犀、越獸馬等，氈即是大理名產之一，可知其淵源流長。所以我竊以爲這是南詔爲傣羅民族所建的證據之一，這在結語一章還要一總論到。

在這部維摩詰經跋記的末一行“佛頂寺主僧尹運富監造”，亦可加添一些注釋以資了解：按大理點蒼山中和峯之南，曰龍泉峯，曰玉局峯，曰馬龍峯，曰聖應峯，然後就是佛頂峯。依理這座佛頂寺就該正在佛頂峯的山麓，只是北宋迄今，八百餘載，不知尚存在否？我於民國二十八年在大理山麓學考古兩月，未曾注意這座古寺興衰沿革，如今身在海島，無從稽考，益增悵望。

然而能得高相國指定造經以饋上國使節，這廟宇一定不同尋常，在唐代已有“勸龍晟，鑄佛三尊送佛頂峯寺，用金三千兩，”(南詔野史)的紀錄，可知自唐迄宋，佛頂寺當爲點蒼山下之名刹無疑。

這座廟宇的主僧姓尹，不知是否爲上述尹輔一家之後？以運富爲名，世俗金錢之念，形乎其外，這又使我們想到了元代郭松年氏大理行記所記的：

“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尙浮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記。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蕩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

很顯然的，這位尹運富先生不是一位“得道之士”，倒很像郭氏所描寫的師僧。既冠俗姓，又以運富爲名，這位宋代寺主倒很可與今日鷄足山上的“子孫廟當家大和尚”並肩相比。鷄山一衣帶水之隔（洱海），和點蒼山遙遙相對，其所謂的子孫廟，世代相

承襲，每有不可告人之劣行出現，當地有謠諺：“大理缸魚有子，鷄山和尚有妻”，實詠其事。如今看佛頂寺主姓尹，很可能即是尹姓之子孫廟宇一座，至於是否如郭氏所說的師僧擁有妻子，文獻不足，無從稽考。只是尹氏以一介師僧，並不因其道行深湛標譽史冊，却因寺主地位，附經卷末而揚名異國，緣知世俗浮名之得，個中亦有幸與不幸在焉。

看這經卷的字體書法，意態端麗，轉折犀勁，唐人經生體的典型依然。邊地上的文化型態，時常是落後於中原若干世紀，所以北宋時光，大理有此種經典寫出，了不為怪，正所當然。看其扉頁維摩詰會圖，唐風儼然，斑斕多姿，金碧輝煌，使我們想到，若雜之於敦煌石室唐代畫叢之中，真是不易剔出，由這裏可以見到這時大理國畫家的造詣，實在是已達很高的水準。

到這裏又使我們悠然想到了宋太祖的“玉斧一揮”之徒勞無功，“大渡河外，非我有也”，這不過是一種政治上的人工區劃而已，壤地相接的文化交流作用，是沒法也不可能以一紙詔令而遽垂鐵幕的。郭松年所記的“所誦經律，一如中國”和這卷維摩詰經的唐風馨郁便都是良好的鐵證。

再看這篇寥寥九行的跋記，其中“國”字的寫法，竟然很明顯分成兩個截然不混的體系：一是在“口”之內，加一“八方”字樣，成為“囿”。凡是大理囿、相囿公都是用它。另一系是在“口”之內，加一或(域)字，作“國”，凡是大宋國、中國都用這個字，涇渭清濁，截然不混。使我們不能不相信這在大理國的人，他們的觀念是十分清楚的，試旁證張勝溫梵像卷中第86單位圖的“建囿觀世音菩薩”也作囿，可知這個字在大理囿人民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別有一番樊籬的，那就是他們是大理“囿”，而對方是中“國”，看“八方”字樣的“器字恢宏”，大宋國的格位又低了四格，說不定他們正在自我陶醉，以為宋代疆域之濶，實不能與大理囿相比。窺諸實際。並不如此，正如“夜郎自大”的故事，邊疆民族心理形態，古今如出一轍，不意維摩詰經的跋記，於此等處又現身說法作證。

若推究這個“囿”的來源去脈，對大理囿言，仍是一個外來借字。玉篇上載：“囿，古文國字，唐武后所作。”正字通上的著錄：“囿，唐武后時有言，國中或者，惑也，請以“武”鎮之。”又有言：“武在國中，與困何異？請改為囿”。——根據這些

資料，可知這個囿字，原是武則天時所創的新字之一，不知何故，輾轉相傳，竟於數百年後在大理國中風行一時？文化交流，伏脈千里，仔細尋求，實在是一件極饒趣味的事。——武則天不願意把她的“武”字，困在四方框中，正如麗江（大理以北）麼些族的木姓土司。他在麗江一帶，不准築城，因為木在“口”中即成為“困”，這對木土司極為不利。這兩件事地逾百哩，時隔千載，但事出一例，昉諸同心，不意中土英“雌”所見，竟與邊疆一小土司完全相同，真是有趣之至！

假如細加推究的話，則武則天這個新字移置於西南邊陲的經過，亦復有蛛絲馬跡之可尋。考唐代武后之時，南詔第二代皇帝邏盛炎曾來中國朝貢，大蒙唐廷優獎，曾賞賜給他很多東西。很可能就在此時，武后所創的新字給他們見到，因而携歸據為自用。

唐代王仁求碑，為持節河東州諸軍事兼河東州刺史，上輕車都尉新昌開“囿”子，公士王善寶為他父親所書，內中用新字甚多：

廬口將求寵於大囿，以和其人民。……

開夜郎之道，綏哀牢之囿（國）……

明④（月）在懷，瓊寶口身……

可同②（日）論哉！……

中囿蒙其惠……為囿家口者已…

咸亨五季（年）八④十五②寢疾而終，春秋卅四

單囿憲之容……小囿附庸，罔弗祇服。璽（聖）人在位，羣生蒙福。

璽曆元季出區拾柒②葬。其季拾區拾②立

考武后聖曆元年戊戌為南詔邏盛炎二十四年，當公元六九八年。就河東的地理位置，我們又找到了這“囿”字的遷徙痕跡，因為這碑文之上，“囿”字出現最多，而且不分中國、外邦，一律以囿字來使用，可知在這時候，尚沒有大理“囿”和大唐或大宋“國”的區分。因而使我們想到，這項區分當是後來才出現的。（七六六年南詔所立的德化碑，因出漢人之手，所以一律作國，沒有給我們新的比較資料）只是五代北宋之間，我們還沒有資料發現，一直要到一一一八年的這卷維摩詰經，才見到這囿國二字，在大理國中已經是壁壘分明。從武后時候到宋徽宗有四百多年的時光，推測武后造字之

原意到大理“囿”的尊爲已用，這種的區分應該是逐漸形成功的。

民國四十九年七月，我在大陸雜誌第二十一卷一二期合刊上，曾以“大理國梵像卷和雲南劍川石刻”爲題寫了一篇短文，內中說中了大理國的字體（新體、別體、合體）有研究的價值，如今僅以一個“囿”字爲例，上起唐初，下及北宋，竟儼然有體系可尋，若彙集梵像卷中各式字體同來研究，我想一定有豐碩的收穫。這在下節梵像卷中還要說到。

總結這卷維摩詰經的初步討探，首先是由經典的跋記上確定了大理國段和譽文治九年戊戌的年代定點，因而把他“日新”年號的時限也予以確定。其“次年改元”的慣例仍遵循着南詔相傳的系統（見向達先生的蠻書校注序）。

其次它告訴我們許多宋朝和大理國使節交往的真實情況，如在廣西購馬之原意和來往路線等，不但由此使我們找到了這兩位大使的姓名，而且把他們的對方大理國相國公高泰明的事實也明白了不少。

佛頂寺師僧的推測和大理特產細甕的研究都是很親切有用的資料，最後還由於閩與國的壁壘分明，使我們細細推索了一番文化交流伏脈千里的痕跡，漢文影響大理國之深，和邊陲民族心理上自大之意，也都一一清晰可指。這一些研究成成果，無疑的對大理國信史的重建和對這支民族心理之瞭解是極爲有用的。

三、聖第安哥藝術館中的雲南觀音像

依照着時代順序的先後，我們探討的第二件資料是一尊銅鑄的觀世音像。這尊銅像不像維摩詰經有西元一一一八的紀年，但由其銘文本身，我們可以推測出是一一四七到一一七二年間的作品，在中國歷史上是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到孝宗的乾道八年的時候。

這尊大理國的銅觀音像現藏在美國加里福里亞州南端聖第安哥的博物館中（The Fine Arts Gallery of San Diego, Calif.），紅漆瀏金，高十七又四分之三吋，寬二吋又半，是該館在一九四一年從 Jan Kleijkamp 先生處中購買入藏。多謝該館副館長 Mr. Carl Skinner 的好意，使我得到了三張精美的照片，一爲該銅像的正面，一爲反面，一爲銘文，現在都用圖版印出，以作我們研究的根據。（圖版貳、叁、肆）